

呼和浩特地区三大宗教 和谐共存的社会历史原因初探

赵渊杰 贺雨微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 呼和浩特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民族城市,在近百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谐共存的历史现象。这一和谐共存局面的形成,有其社会政治文化原因,也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所致。

【关键词】 呼和浩特;三大宗教;和谐共存

呼和浩特市(本文所指呼和浩特地区并非今天呼和浩特的范围,而是包括呼和浩特市及其周边的土默特地区和四子王旗等地),位于阴山山麓、土默川平原,自古为北方重镇,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所在地。1575年阿勒坦汗兴建“库库和屯”,明朝时称为“归化城”。清朝时,又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在归化城东五里处建城,清廷称为“绥远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蒙、汉、回为主体的各民族长期和谐共生的历史局面。同时,由于不同民族所具有的不同宗教信仰,在历史上,也有不同宗教场所聚集于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地区大北街至大南街一条直贯南北的街道上,依次坐落着天主教堂、大清真寺、大召三大宗教场所,三大宗教场所有着近百年来和谐共存的历史传统。

一、三大宗教在呼和浩特地区和谐共存的政治文化原因

(一)三大宗教传入呼和浩特地区处于不同的时代并与当局保持密切联系

1.黄教(藏传佛教的一个宗派)。三大宗教中,黄教最先传入呼和浩特地区,当时掌握地区当局政权的是阿勒坦汗,近人所编《绥远通志稿》中记述了黄教传入呼和浩特,并且与阿勒坦汗当局接触的详细过程。“阿勒坦汗中年后,以诸子皆强壮,可任兵。己则劳于戎马。稍稍厌战矣。闻西藏有活佛曰达赖喇嘛。习其法能铲除恶孽。得证善果。乃遣使求其经法而信奉之。”^[1]黄教传入呼和浩特地区时,阿勒坦汗与明朝政府常年征战,边民生灵涂炭,其本人年事已高,无心继续战争,产生了潜心向佛,行善积德的思

想。在阿勒坦汗的极力推崇下,黄教在呼和浩特地区以至于整个内蒙古地区迅速发展。喇嘛人数不断增多,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宗教势力。在黄教的传入阶段,其基本教义与当局最高统治者的意图趋同,因而得到了当局的有力帮助,使得宗教信仰与地区政权紧密结合,营造了呼和浩特地区最初和谐稳定的政治宗教文化氛围。

2.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传入呼和浩特的历史几乎就是回族迁入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呼和浩特地区,宗教信仰与民族成分结合最为紧密的即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大规模进入呼和浩特地区大致于清中叶。这与清乾隆时期平定大小和卓之役有着密切的联系。“顾其传入绥境。而延为今日之回族宗教者,则始于清乾隆时平定回疆之役。”^[2]最初定居呼和浩特地区的回族,是帮助清廷平定和卓之乱并建有功勋的回族军队,“回将额敏、和卓、霍极斯、鄂封等皆受封。”“其出力回军之一部则驻归化城外候命。总数不足千人,初居于城东南三十八里之草原。恣其住牧。日久遂成村落。并建寺以崇其教。”^[3]作为平定叛乱的有功军队进驻绥远地区,必然受到当局的重视,伊斯兰教作为其民族性的宗教信仰,也受到了当局的重视与尊重。从文献记载(“恣其住牧”、“建寺以崇其教”)中可以看出,回教传入呼和浩特地区之初,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原因,受到了地区当局的密切关注。

3.天主教。在上述三大宗教中,天主教最晚传入呼和浩特地区。据史书记载,“清咸丰年间,即已萌芽。”此后,在同治二十年、光绪八年,其所设教区规

模逐渐扩大,势力渐强。从中国近代历史大背景来看,天主教在呼和浩特地区大规模传播,是伴随着西方经济、军事入侵一同进行的,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控制手段传入呼和浩特地区。天主教在呼和浩特地区传播发展,与当局的关系也是颇为密切的。我们通过各种地方志中的记载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清代以来,呼和浩特地区,诸如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这样规模较大、信徒众多的宗教,一直与当局紧密联系。这就为历届当局管理、引导地区宗教机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由于当局与几大宗教同时具有着密切的联系,保证了当局政府在各宗教间的沟通协调能力,一旦出现大规模宗教间的矛盾冲突,当局为维持社会稳定,从中调停,因而减少了宗教之间出现大规模矛盾冲突的可能性。

(二)三大宗教信徒民族成分具有较为明显的划分

呼和浩特地区三大宗教的信众分配基本处于均衡状态,体现在宗教间的信徒具有着明确的民族比例划分。当然这种区别并非人为,而由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1.黄教。经过走访呼和浩特大召寺、席力图召等藏传佛教场所,笔者发现呼和浩特地区黄教的信徒主要以蒙古族为主,这与阿勒坦汗迎黄教入绥有着很大的关系。时至近代,呼和浩特地区蒙古族的喇嘛教信仰依然体现到生活习俗中的方方面面,火葬是呼和浩特地区土默特蒙古族的主要丧葬方式之一,“其方式为:人死之后,首先要请喇嘛诵经,然后将尸体附以茶毗,用火焚烧,将骨灰送入喇嘛寺内捣碎,与面粉等混合制成饼形,或存于喇嘛寺中”。^[4]另一种主要的丧葬方式野葬也加入了很多的喇嘛教色彩。由于喇嘛教对呼和浩特地区蒙古族日常生活影响至深,因此其他宗教的思想很难再渗透到其社会生活中。经过调查发现呼和浩特地区天主教入教信徒中,蒙古族数甚少,不超过十人,数目远远少于汉族信徒人数。归绥地区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曾经拟定“以蒙民归奉圣教为目的”的传教方针,但是天主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状况并不成功。

2.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呼和浩特地区的信众主要以回族为主,由于其主要原因在于伊斯兰教是回族的民族性宗教,当婴儿一降生,按照回族的民族习惯,就已经成为伊斯兰教的信徒,必须遵守伊斯兰教的戒律。这就保证了伊斯兰教在呼和浩特地区的信徒数目,其基本与呼和浩特回族数目趋同。因此通过统计呼和浩特回族人口的演变趋势,我们可以大致考量呼和浩特地区伊斯兰教信徒的数目以及其演变趋势。

3.天主教。天主教在呼和浩特地区信徒以汉族为主,这与近代以来中原地区汉民大规模迁入蒙疆

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联。清朝末年,由于饥荒与自然灾害频发,大量中原地区的汉民逃荒来到呼和浩特地区,进行经贸贸易。由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赔款数额巨大,清廷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当时中原一代财政状况已不能负担这样沉重的压力,迫使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蒙地放垦”^[5]政策,因而大批汉民迁移至呼和浩特地区居住。这部分迁徙来的汉民,初至呼和浩特地区时,缺乏基本的经济资源——土地,精神生活也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之下,“乡村民众除年节期间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娱乐外,其余时间大都为生计所迫而奔忙”^[6],“绥远的农民大多来自山西、陕西等省份,初至荒凉的塞外,衣食无着,更谈不上掌握基本的生存资料和工具,地权又集中于蒙旗、地商、教会之手,所以入教而领得一份耕地成为移民谋生的一个简单选择。”^[7]当时天主教为吸引这一部分汉民入教,便购置田亩土地分与汉民耕种,同时向这部分汉族民众宣传天主教基本教义以填充其空虚的精神生活,之后大量汉民纷纷加入天主教。我们可以从绥远地区的一首民谣来佐证上述现象:“为什么信教?为了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为了小米三升。”^[8]这一直影响到了今天呼和浩特地区天主教信徒的主要民族构成。据呼和浩特天主教堂庞神甫介绍:“目前就呼和浩特通道街天主教堂信徒来看,信徒民族成分主要为汉族,没有回族,蒙古族信徒数目非常少,只是个位数。”

(三)呼和浩特三大宗教形成了社会关系,习俗交集

因教义的分歧,往往会造成宗教间的矛盾。在呼和浩特地区,由于上文阐述的诸多社会原因,形成了和谐的宗教文化氛围。三大宗教在“博爱”方面的教义共识得到发扬光大。可以做到基本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在教义方面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形成了和谐相处、与邻为善的精神共鸣,这也是维系近百年来三大宗教在呼和浩特地区和谐共存的精神纽带。由于三大宗教传入呼和浩特地区距今年代较为久远,因此与呼和浩特地区的社会生活已经融合,呈现出本地区生活习俗的烙印。实地调查发现,呼和浩特天主教堂门前,也像传统汉民族一样张贴对联,“晓星照耀千秋不夜”“玫瑰花开四季常青”,横批为“仁爱之泉”。宗教教义与地区民俗相结合,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淡化三大宗教间宗教教义方面的分歧,使之在呼和浩特地区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同语言。

虽然宗教信仰不相同,但是呼和浩特地区三大宗教的信徒在社会生活中却有着诸多的社会联系,例如,工作关系、婚姻关系以及亲戚关系,而交织繁复的社会关系,使得呼和浩特地区不同宗教信徒的沟通渠道多元化。沟通渠道的多元化保证了不同宗

教间信徒沟通的畅通性,进而彼此包容,将分歧仅存于信仰层面而不至于上升到社会性的矛盾冲突。

二、三大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经济原因

(一)呼和浩特地区黄教的基本经济收入模式

从经济环境来分析,由于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特殊地位和在蒙古族中的影响,明清两朝对藏传佛教采取扶植、鼓励的政策,其宗教活动场所召庙,大多为明清统治者为了地区稳定而修建,从经济来源上说,较其他宗教具有稳定的优势。呼和浩特地区的召庙大致修于明清两朝,从召庙中的喇嘛人数可以看出寺院经济的繁盛足以供养这些召庙和喇嘛。所以在民国以前,召庙凭借政治、宗教影响,所得经费、香火钱和地租足以满足日常的开支。除此之外,各召庙在旧城的大南街、小北街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房产,与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不同的是,召庙所占有的土地是当局统治者赐予的,所以并没有土地成本支出。召庙的土地牧场一般是由当地旗官员从所辖牧区中划给大喇嘛或寺院的。据记载,“呼和浩特地区的席力图召牧场地处大青山北侧,与察哈尔、四子王旗和乌拉特旗接壤。”^[9]“民国初年在勘察呼和浩特地区开垦情况的记录中记载着席力图召属庙锡拉木伦庙名下养赡地有3000多顷和在普会寺迪巴敖包有1000多顷牧场。”^[10]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召庙的土地牧场广阔,他们雇佣劳动者在上面开垦放牧的所得及出租耕地牧场的租金是寺院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呼和浩特地区伊斯兰教的基本经济收入模式

归化城在清朝顺治年间已成为边疆的重要商业城市,顺治十一年俄国使者巴伊科夫来归化城考察时在报告笔记中记述了“作藩贸易蜂聚蚁屯”和“驼马如林”的繁荣景象。清王朝建立后,如前文所述有大批回族因经商、战乱、天灾、通婚等原因进入内蒙古地区。这部分回族,生存资源十分匮乏,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大多经营起私家作坊商埠,在很大程度上繁荣了呼和浩特地区的市场。回族基本上是“以族护教”,他们在聚居区集资或募捐兴建清真寺,“所以免悬隔而便礼”^[11]。定居于呼和浩特城北门外的回族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兴建了清真大寺,后于1789年进行了扩建,扩展了大殿,盖了南北讲堂,并建过厅一座。“这次扩建是由当时经商的康、陈、马三户回族发起的,这三户出了大量的资金,并从人力上给予支持,一些回族群众当时也捐了款。”^[12]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与藏传佛教不同,伊斯兰教没有统治者的支持,完全依靠教众自行捐赠,回族素来以重商为俗,且收入不菲,在伊斯兰教中亦有“课功”,即规定信徒对真主的捐献数额,使得捐赠上升为一种宗教义务,这样清真寺的经济来源可以保持稳定。

(三)呼和浩特地区天主教的基本经济收入模式

呼和浩特地区天主教利用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的赔款,大量购买土地房产,扩充了实力。天主教在绥远地区以教堂为中心向周围扩展土地,农村的土地数量远大于城镇。初期,在地理区位选择上,伊斯兰教、藏传佛教选择了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而天主教选择农村,从而避免了争夺土地资源的情况发生。天主教土地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向蒙古王公购买,还有向蒙民租用,在庚子事变后,有些地方拿不出给教会的赔款,不得已用土地来偿还。教会资金来源主要是清政府赔款,剩下的为教内捐赠。如“一九〇七年,厚和市(今呼和浩特)三合村兴建教堂设施,半为教堂出资购买,半为教友捐献”。^[13]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可以总结出呼和浩特地区宗教事务的处理机制,即:1.官方的紧密沟通疏导;2.形成宗教信徒在三大宗教间的均衡分配;3.宗教教义与地区文化特色的紧密融合,以及不同宗教信徒社会关系的多元化;4.各宗教在经济收入方面通过不同的渠道维持自身经济独立。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三大宗教在呼和浩特地区近百年的和谐共存局面,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希望可以为学术界研究宗教民族方面的社会问题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绥远通志稿》卷五十四,宗教(佛教黄教),黄教之入绥。
- [2][3]《绥远通志稿》卷五十四,宗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来绥之始末,124。
- [4]《绥远通志稿》卷五十四,宗教(天主教)天主教在旗县之传布。
- [5]启戈.晚清归绥地区的移民问题研究[M].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4)。
- [6]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116。
- [7][8]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问题[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81,82。
- [9]《清宣宗实录》第47卷,道光元年十二月。
- [10]胡日查.清代内蒙古地区寺院经济研究[M].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53。
- [11]《绥远通志稿》卷五十七·宗教(伊斯兰教)。
- [12]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呼和浩特史料(第一集),1983:287。
- [13]赵坤生.近代外国天主教会在内蒙古侵占土地的情况及其影响[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5(3)。

(责任编辑:齐秀华)